

## 新时期的社会问题

裴敏欣：收入不平等，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是失业问题。我们先讨论这两个。

吴国光：我先对老孙这个论文作一些评论。首先，你的主题其实是“社会抗议”，而不是广义的一个“抗拒”。“抗拒”还可以有其它方式，可以不采取‘抗议’的手段。其次，这里完全是由规模来分类的，但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指标，就是从政治层面界定的一些其他的指标，而不仅仅是规模问题。其实，从一类的规模不会发展到二类和三类，在很大的程度上，在过去的现实中，是因为当局采取政治高压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个隔离或这个隔离比较弱的话，不同规模之间的转换是很容易发生的。再次，在稳定和动荡之间，我觉得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它就是所谓社会不稳定，但是没有动荡。它可能是社会不安，可能有社会惶恐，但是也没有动荡起来。我觉得，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恰恰是现在比较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心，因为今后可能是这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但是也没有进入动荡的状态。（裴敏欣：我学政治学的时候，一个老师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不稳定和危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一个是房子过热，你在这里很不舒服，但是它不着火。现在很难确定的就是，它热到什么程度，你就呆不下去了。）

你对腐败与社会抗议之间关联的分析很好，就是说腐败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但是，不满情绪不一定导致社会抗议。其实不仅是腐败，贫富悬殊也是一样，你也可以说贫富悬殊也不会导致社会抗议。（孙立平：贫富悬殊通过什么方式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动荡？我想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前半截，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导致民众不满情绪的因素太多了。现在的分析是说，为什么民众如此不满，但是没有导致社会抗议？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重点。。然后立平讲了“导火线不可预测”，其实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预测的。问题是，能够预测到的，往往是后来不发生的，这是因为你预测到了，当局也预测到了，当局就采取措施把那个雷管拔掉了，把导火索拔掉了。比如说，这场比赛可能会发生球迷闹事，那当局一定在那儿重兵把守。89年的事情其实当时都预测到了一些导火索，说“五四”七十周年可能是一个，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也可能是一个。可是，凡是你能预测到的，他也预测到了；他预测到了，就采取措施。这不等于说不可以预测到。

再一个看法呢，我觉得，现在社会的抗议，越来越多是下层民众的抗议，所

谓穷人的社会抗议、弱势群体的抗议。在有关社会抗议的研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人是没有资源的。社会抗议的重要资源，就是组织的技能、交流的技能、闲暇时间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他们都缺少。这是一个原因，使他们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另外，抗议的代价也太高，那就是社会高压在起作用。你要搞抗议，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都是和你刚才讲的“个体化反抗”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因为我没有组织集体活动这个能力和资源，那到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是把我个体给牺牲掉了来反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还有，你提的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大规模的民众造反需要三个条件”，可惜你不展开讨论。这三个条件，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地判断一下。比如，下层精英的参与和组织，这可能已经有了。昨天于建嵘就不断地讲到退伍军人的参与，这就是下层精英，他们比一般的民众更有技能和知识来组织抗议；第二个，政府的镇压能力不够，这显然不是。政府的镇压能力，我认为足够。第三个是领导人使用武力的意愿和决心，我认为这个也是很强的，现在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往往不该出手时，他也出手了。因为他很紧张。）我觉得，可能不止这些条件，还有另外的条件。粗略地说，一类是抗议者这方面的条件，一类是政府那方面的条件。政府那方面，他是准备好了做任何事情来镇压的，他也有能力，他也有意愿。而另一面好像不容易看得清楚。在这一面，我想，除了下层精英的参与，可能还有其他的条件作用于社会抗议运动，要么是消灭它，要么是使它发展得很快。

丁学良：我有两三个技术性的问题。你在定义“社会抗议”的时候，“常规性、局部性和全社会性”这三个定义，大方向我是同意的，但是不是可能还再精细一点？因为局部的也可能是常规的。根据我们科技大学一个研究生做的一个经验研究，这个局部性抗拒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性的。什么叫常规性？就是一年365天，在中国，这种事情总会是很大一部分的数字在发生，虽然它不是在每一个区域都会发生。还有就是一下子从局部跨到全社会规模，我觉得这一步跨大了一点。这个全社会规模的抗议，我们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八九”，一个就是法轮功。我想这中间能不能再多一个层次，比如说‘大规模的’、

‘跨区域的’之类。（×××：城乡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发生在北京，小事也是大事，有两万人，那一定是大事了；如果发生在四川农村，两万人饿死可能都没人知道。）（×××：假设说，像今天大庆，如果要和胜利油田等几个油田联合行动的话，可能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不是全社会的，但是超越局部。）你这个“全

社会”差不多是等于全国性的了。（xxx：还有行业性的，或者是整个阶级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腐败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因果关系。你有一点我同意，就是说，腐败，除非腐败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直接的经验关系以外，一般来说人家发牢骚，人们不满，但是不一定马上就是冒着风险抗议。你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讲的是工厂，腐败导致工厂关门呀之类。这里面有个问题，要把它讲清楚一点，就是说对腐败的分类问题。中国一讲到腐败的时候，什么都在腐败里边。假定你不把腐败的定义搞得比较清楚，把腐败分析为不同的类型的话，就很难讲腐败引起抗议还是不太能够引起抗议。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看到报导，说北京的老百姓抗议那个新国大——就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的公司——发行什么股票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腐败引起了社会抗议。这种比较新的形式的、金融方面的腐败行为引起社会抗议，这种可能性以后可以是很大的。

徐成：你讲到，1000 亿的成本，平均分到全国老百姓头上，不构成很大的问题。但是，腐败它恰恰就是不让你平均分配的过程。在某个地区、某个行业，它可以非常严重，造成局部性的问题。再就是刚才学良提到的，腐败类型不一样，并不简单地就是贪污受贿。腐败有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司法的腐败，因为腐败造成的司法不公的问题。

丁学良：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比较性的部分？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的现象，在不同的形式上，都在1992年之前的苏联、东欧国家发生过这类似的事情。应该有所比较；没得比较的话，我们总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特色的东西，其实比较以后就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现在国家机器那种东西，管社会治安的，这些年来已经强化到这种地步：基本上，除了法轮功以外，都已经是把那些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或者消灭在比萌芽大一点点的状态当中了。可是，能不可能从此就作出一个结论，就是这即使不是开万世太平的话，至少要开个十年、二十年的太平，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预言？你看看苏联、东欧的时候也是的，东欧当时反抗很多这里要反抗，苏联坦克进来了；那里要反抗，苏联坦克进来了，机关枪上街了。我觉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对未来有多大的意义，有多大的精确的适用意义，这要稍微谨慎一点。

时殷弘：老孙的这个文章，我们身临其境的，对这些问题都很亲切也很熟悉。导

致社会动荡的深层因素啊，失业下岗问题、农村农民负担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都存在。但是，如果从现在中国实况来看，特别是从政府的注意焦点来看，我说还有两个问题，影响都很大。一个就是宗教还有所谓邪教问题，包括法轮功问题，可不单是法轮功；还有一个是民族问题，最近几年新疆的不稳定是太厉害了。这个问题不是常规性的，也不是你所讲的意义上的局部性的，当然也不是全国性的。宗教问题、邪教问题都牵涉到一个人权问题，带有社会性；民族问题呢，至少是地区性的。这两个问题，与前面几个问题相比的话，似乎更容易被动员，更容易被组织，而且更好斗，而且比较政治化，是很大的问题。

你讲了很多很多社会动荡的诱因和主题，刚才老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社会动荡的形成机制、形成过程，可能还需要更多地来思考一下。比如说动员、组织、精英的作用。就像湖南的那些退伍军人，就是个精英的作用。还有的时候，仅有一个主题还不够，它还有一个能够使得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情绪性的一套说法、一个思想或者一个信条，恐怕就有意识形态的这个作用。这些问题，也许除了宗教问题，单个都不很要紧的，但往往它有一些间接的诱因，政治性事件，会把这个事搞得非常情绪性，而且引起原来根本不关心这个主题的其他人的情绪激动，凑起来它就会成为大事。

我们现在假定政府的资源、能力和意识都足够来控制社会动荡，但这是从“六四”以后得到的这些。如果我们回想“六四”的话，政府是不是始终能有坚决控制社会动荡、坚决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的这种远见、智慧跟辨识能力？在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人群的时候，牵涉到一个很大地区的时候，政府是不是有控制决策的意识，往往是成为问题的。

郑永年：我原来是非常主张渐进主义这样一个模式，但是后来看了欧美国家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发现政治的进步跟社会抗议是绝对不可以分开来的。可以说，没有社会抗议，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政治进步。就改革而言，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上层，但是没有这个社会抗议的压力不行。你看欧美的整个的到现在的进步，都是跟这个有关的。美国也好，都是比较制度化的，让老百姓发泄出来也好。而这在中国是没有的，完全就是政府在镇压的情况下，把社会运动、社会不满“非组织化”，你到最后只能表达为个性，包括以后可能是恐怖主义也好，个体的反抗也好。你说社会抗议不可能，那你必须解释，已经出现的社会抗议，它为什么会出来。它已经在发生了，还会怎样发生？（吴国光：这个注脚里面，说中央党校这个调查，发现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些。其实，这些因素不是并列的。永年刚才提的很对，可能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政治体制本身，这个

政治体制不能制度化地消化各方面的不满，那就造成了社会抗议。)一种制度要能容纳这个社会抗议；如果它是完全排斥的呢，肯定就要走向对立面。

孙立平：这种镇压的能力，并不是仅仅来自政治体制和中央的；实际上这个镇压的体制呢，它是在村和乡镇一级就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它有一个越级上访的承包，就是你这个乡越过县里到市里去上访的，今年给你两个指标，然后它是一票否决的。如果你这个乡今年达到3个，那你所有的评奖都没有了，一把手要承担责任。所以呢，为了防止这种上访，他在底下这一层就折磨你，给你抓进来啊，打你啊。乡又把它承包到村里面。别的方面也是一样，定了指标的。北大每年因为交通事故你可以死亡0.5个人，死了一个人就超标，要罚款，没死就表扬。

熊景明：控制的力度其实还是相当有限的。犯罪学有一个研究，凡是这个黑社会和集团犯罪，都和一个东西最直接相关，就是政府的贪污问题。还有那个司法系统的腐败。我们都从这个社会动荡啊，治理动荡的手段呀来看，老是从国家角度出发。我觉得，还是要强调整个的法律体制。在中国的政治特点下，不是“法检公”，而是“公检法”。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人都看得出来，从法律的研究方面看，中国好像越来越自由化，但实际上，公安仍然是搞“严打”。这种“严打”的结果呢，只会造成更大的反抗。这个研究指出，你不要看中国现在所有的这个犯罪指标都再全世界最低之列，但是它那里有个不断提供犯罪环境的那个温床，这就是贪污问题加大，促使集团犯罪和黑社会的出现。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表现在基尼指数上。你想，1978年的基尼指数是0.18，到了2000年，就变成了0.5，这个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没有过的，而且是遏止不了的。基尼指数这么扩大以后，就是贫富悬殊，这也是世界上少见的。研究证明，它是导致犯罪的最大的原因。

目前的农村研究，像于建嵘、李昌平他们对农村的那个生存危机的研究，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比如说，李昌平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农村不会有大乱，因为没有目标了，不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了，田已经分完了。他也有另外一个看法，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就是现在我们完全不能把农村与城市分开来看，它实际上已经一体化了，农村可以制造出流到城市里的这些民工。还要想一想他们的第二代，甚至他们的第三代，这些人绝对会是形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大的因素。现在，这些人在城市里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子比比皆是。去年过年，南京的一个人剥光身体，爬到电线杆子上，就是要求“给我工钱”。这些人蕴藏着不满，而他们的小孩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觉得，这些人将来如果成为走投无路的一群人的话，他一定会成为社会不安的一个因素。

至于农村的税费，这有不同的分析。像李昌平，他认为有四千亿；还有人认

为有五千亿。不过，很明显的是，农村那个税费改革，他就搞不下去。因为他是算乡镇的这些人的工资，数字当然出现一个最小的，其实要更多。为什么搞不下去？如果只是拿得出两千亿，当然就搞得下去。实际上是他们一搞就发现，原来估计的那个数字是大大不够填那个空白的。

孙立平：这个搞不下去，就我能了解到的情况，第一位的原因是教育。农村当中的教育，大约是占六七百个亿这样子。所以，像安徽为什么搞不下去？首先就是教育比较麻烦，农村里面教师的工资，首先没法发放，农村当中的教育经费彻底没有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熊老师也提到，就是农民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很可能是社会抗议其中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为什么？去年这一年，全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是五百亿到六百亿。农民工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在四五百块钱的样子，每年的工资应该是五六千块钱，那么，这就是说，有一千万个农民工，这一年没有领到工资。也就是说，去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有一千万人是用做奴隶的方式支撑了。这是几百个亿啊！再加上他这个费用。因为中国地域太大——要是在香港，这个流动还比较好办，没多少钱，你走回家都能走回去——他从贵州跑到了深圳，费用是一个很大的费用，流动的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不铤而走险了。但是，这可能在治安的层面上问题更多。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老板没给他发钱；但是更严重的是，老板也没结到帐，因为现在大陆建筑业都是“垫款施工”，就是说老板都是先用自己的钱买材料，建完了之后才能结帐。

徐成：我讲一个观点，再提一个问题。一个观点是什么呢？我同意，腐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两个本身不至于造成抗拒的原因；但是，它是一个放大机，一个添加剂，一个转换机。就是当经济增长还可以的时候，还有7%的时候，那么大部分的人的收入都还上升，大部分都有工作可以做，大部分欠产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这时候呢，大家虽然对腐败不满，但是还不至于导致这些人上街游行，大规模组织起来抗议。社会不公平也还可以接受。但是，当出现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低于6%以后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工作了，很多人的收入，绝对数的收入，下降了，结果一看呢，欸，其他人的收入上升了，其他地方和部门搞搞腐化，这一下就不得了，就是变成了一个放大机，一个转换机。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抗议在有些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导致社会进步、制度创新，而中国确实也有这样的，有些抗议导致了社会创新，但是有些抗议它不是，它变成了更严重的问题，矛盾转换了、激化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什么样的社会抗议，它能够被转换成制度创新的来源？或者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种比较安抚的形式、制度变迁的形式？

丁学良：国家领导精英的方面，比那个抗议本身更重要。就是一些很破坏性的抗议，如果你这个国家大的政治架构、法律架构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比较具有那种弹性的话，仍然可以把这种很无序的抗议转变成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史上，往往是，哪怕一些非常非常理性的抗议，都可能成为动乱。

孙立平：如果从抗议的角度来说，要看它的要求的明确性和可处理性。“六四”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两个要求：一个，加强改革；第二个，反对腐败。你说，他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呢？政府那边他说，我也不是不改革，我也不是不反腐败，是吧？就是说，你这个要求，首先要尽可能地接近政策能够处理的条件。那就是说，你这个要求要经过凝聚和明确表达的一个过程。这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个凝聚和明确的表达它需要组织条件。最次的这种层面，是所谓利益群体的层面；最高的一个层面是政党的层面。那么，一般说，如果这样一种利益要求要经过政党这个凝聚，然后呢，它可能和政策层面比较接近，比较容易为政策所处理。否则，它导致的一个模式就是像“六四”那样。按道理说，你要是明确的话，应当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这边有这种要求的人上街，别人别插后面，对吧？比如，我们是残疾人，我们是要求这个，不是残疾人你别插进来“反腐败”。可是，在中国，它导致一种特例的模式，就是说，你必须全赢或者全输。然后只能用壮大声势的办法，就是大家都进来。都进来，就只能喊一个大家都关心的口号，就是“反腐败”了。（xxx：在中国，你在哪里抗议很重要。天安门广场、中南海那里，绝对不能去。你一去到那里，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郑永年：我比较熟悉苏哈托 1996 年到后来垮台的情况。那时候，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对他有影响。印尼的老百姓提出两个目标：一个“反腐败”，一个“收入不公平”——就是跟中国一模一样，也是非常广泛、一般化的要求。腐败不仅仅是一种动员的工具；腐败多了，这个政府本身就没有合法性了，所有的老百姓就认为你烂掉了，恨不得马上把你扔掉。很多的老百姓，最后有这种感觉，这很重要，你这个道义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这时候，你已经不在意苏哈托他的政府表现是不是已经腐败，老百姓已经忘掉他以前 30 年的经济成就了——那个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腐败已经不重要了，人们都认为你就是腐败的。这对老百姓的心理作用非常非常重要。苏哈托又犯了错，你说我腐败，他就把矛头转向这个“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而这个不公平呢，又是由华人引起的，又转向这里，甚至军方制造一些事件把这个东西转到那里去。结果呢，因为政府方面没有改变，结果就变成最后的垮台。他这个制度，跟中国差不多。比如说，对社会抗议这个

东西，他没有一点点的引导性，因为他习惯了就是镇压、镇压、镇压。像马来西亚，就稍微好一点，因为它一种容纳性、容忍性。怎么来处理，你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比如说，你提出什么样的目标，我就限定在什么样的目标上，它没有一个扩大的效应，不至于把整个政府说得很腐败。

吴国光：就是永年说的，它一点容纳性都没有呢，就是说：它要么就没有出现大的动乱，而要出现的话，那就是不可收拾的。现在这个机制，就是你想拖延啊，拖延啊，拖延到最后，全都积压到一起，一下子爆发。

孙立平：社会抗拒方面的精英，在这种体制当中，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精英们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安全感的问题。如果不是这种体制，你可以讨价还价啊、妥协啊，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现实是，你只要曝光挑了头，你没有退路，要么你马上逃亡到国外去，要么就进监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最后，这个抗议的精英他本身的目标，和一般人的目标就不一样了，逼上梁山了。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我们研究一个村里的上访，就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村组织的这个抗议能持续 20 年的时间？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如果停下来，他和支持他的民众就失去联系了，就没人保护他了。这是事情不断激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为什么“六四”后来王丹这些原来都已经沉寂下来的人重新发动绝食？就是这个原因。到现在我也认为，绝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安全感的产物，而这种不安全感，是和这个社会、它的体制使得抗议的精神人物所处的那个的位置和遭遇，有直接关系的。（裴敏欣：这个制度没有网开一面的可能。）

徐成：讲社会稳定问题，它一定是三方面的互动关系。一个是社会抗议群体，一个是维护现有社会体系的群体，一个就是现政权。如果我们仅仅是谈这个社会抗议群体的话，不考虑到一个政权和维系这个社会体系的这批人的反应的话，恐怕很难得出一个全面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同意一个观点，就是从目前来看，苏东时代的那个社会巨变它有个基本前提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当时有这么一个坎，还是因为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因为当时的社会，在苏东那时候，整个没有经济改革之前的社会结构，你把所有的人几乎放在了一个同等的社会状况下，他们面临同样的命运。这个情况下，虽然是非组织化的社会，但是它有可能产生集体的行动。只要有一定的突发事件，就会导致这个集体行动。而中国的改革出现



的问题是，它每一步的改革都产生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在这个改革下受益，但有一部分人受损。所以，改革这二十多年来不断地产生维护这个体系的阶层，他们构成社会稳定的一个力量，所以就比以前要复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很难出现一下子垮台的这样一种状况。这个失业问题啊，农民负担问题啊，像这些都是下层或者一部分人的社会问题，而这部分人，就是刚才国光讲的，他们掌握的政治经济的资源比较少，包括组织资源比较少。还有贫富悬殊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其实是个很含糊的问题，所谓贫富悬殊就是有些富人，有些穷人，他们之间的差距大。我们谈论的贫富悬殊是个社会问题，但是具体到社会抗议里面，一定是穷人在抗议，而不是富人在抗议。（吴国光：现在也有富人抗议的例子。前几个月，8月份的样子，北京有一群业主组织了抗议活动。）（孙立平：一种是富人的抗议，就是要发财的；一种是穷人的抗议，就是被拆迁的；第三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的抗议，就是说什么保护文化遗产啊。）这是从社会抗议的方式来讲，我是说从贫富悬殊角度来讲，富人他不会抗议贫富悬殊，一定是穷人在抗议贫富悬殊。所以，从几个角度来讲，最终都是社会下层集团对现有这个社会体系进行抗议，一定是有人抗议，有人在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很难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者是不稳定的情况。

我不太同意你关于政权腐败问题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腐败问题就是造成不满，和社会动荡之间缺乏一个很清晰的逻辑联系。其实正想刚才永年讲的，恰恰是因为政权腐败，它可能把所有的人或者大多数人放到一个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这样一种社会框架中去。如果这个腐败问题继续下去，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的话，那么应该说，社会的大多数人，无论你是穷人也好，是富人也好，哪个阶层的或者哪个群体的都不论，他们一定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共同利益，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一个失去信用的政权让他们产生危机感，这有可能造成一个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

我是觉得，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非组织化状态，反而使这个政权面临这种动荡的可能性；相反，如果出现了有限的组织化，反而会减少动荡的可能性。（丁学良：共产党本来就觉得你这个问题是笑话，它不一定接受你的看法。）它是不是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知道，单位是一个控制机制。无论是人民公社也好，企业也好，它是一个社会控制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生产单位。从中国这几年发展来讲，基本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这个社会控制的手段已经丧失了。国家、政权，越来越面对的是一个非组织化的趋势。

丁学良：有限的组织化。有一部分不涉及到政权的基础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技术化。技术化以后，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法律架构，那么老百姓的很多平时的不满，就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得到缓解，甚至得到解决了，才不会把这种东西演变成一个又含糊、又具有总体动员能力的东西。

吴国光：做不到这一点，这里面有个原因。不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光是这个政权的高度警惕性的问题。它这个内部的利益集团太多，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不涉及政权稳定的问题，但可以涉及本地官员的升迁，涉及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所以它没有这样理性的考虑。

徐成：社会有限的组织化，有利于政权跟这些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是重新建设社会控制体系的有效手段。你可以有法律的控制、财务的控制等等。现在也不是没有组织，但那些组织不起作用，因为它没有参与性，没有代表性，没有把社会酝酿在下面的潜流、无组织的潜流、利益的潜流整合起来。那么，你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么就不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孙立平：刚才讲的乡镇机构的规模和农民负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国家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这样庞大的乡镇机构的存在，确实是农民负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养乡镇的这样一个机构，又是它能够控制农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假如说，它这块不养了，乡镇干部的态度转变了，农村是一种什么情况？对那种普遍的农民抗拒，我不知道乡镇这一级政权是什么态度。或者是默许，或者是控制不住，能力不够？根据我们在四川农村做的调查，我们发现是有默许的。乡和县这两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和支持农民的抗拒活动的。我们都在说，乡镇干部从农民那里搜刮，然后他们获得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进一步地研究，你会发现，乡镇确实也持一种“这个问题我们确实解决不了，我们默许他农民上访”这样的态度。如果这样的态度普遍出现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到了。

裴敏欣：听刚才的讨论，感到中国目前的制度的确算高风险运行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不满情绪。现在唯一不能知道的是，从不满情绪到总体危机爆发——并不是局部危机爆发——这当中是一个什么机制。这是一个未知数，但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因为这是没法研究的。总的来说呢，你一旦有了一个高风险的体制，问题就很大了。这时候，你如果只是把眼睛放在避免那个导火线，应该说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有把基础的一些东西、深层的一些问题给解决。对那种很断言地说“中国不会爆发很大危机”，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谨慎

一点。因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高风险的这种体制啊，要么不爆发危机，它只能一次，也就是说一次之后就太晚了。第二个呢，要跟腐败连接起来。腐败不只是一个激发不满情绪的因素，它也是导致体制崩溃的一个内在因素。它本身加剧了体制内部的系统性风险，尤其因为里面的体制信息流畅不通。然后呢，政权的利益个体化了。我们在分析抗争的时候，看到了集体行动的困难；但是，要保护政权，也需要集体行动，也需要政权内部的那些代理人来集体行动。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假设他们有集体行动的内在动机，而反抗的人就缺乏这种集体行动呢？你如果看最近的一些政权垮台，那真是不堪一击，像印尼、东欧那种。当然，从爱国，从希望中国继续发展的角度，希望这几种情况万万不能发生。但是，要作为一种警报，非得提出来不可。

裴敏欣：稻葵先讲一下失业问题。刚才老孙谈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失业的进一步扩散。想请稻葵讲一下，中国目前面临的失业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稻葵：失业问题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关门、破产，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是新增加的城镇就业人口，比如说高中毕业生，甚至于大学毕业生。同时呢，投资不足——这是金融系统的问题，很多有利可图的私人企业、私营企业的项目得不到贷款，不能上马，不能投资，这就产生就业不足，是由就业不足产生的失业问题。第三个就是其他来源，包括农民进城之后使得城里的很多普通工作的工资大幅度下降，使得很多城里的工人——不管你失业的还是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在目前的这个工资水平下不愿意就业，不愿意工作。这就产生了这种选择性的、自愿性的失业，而不是非自愿的失业。严格的说这个不算是失业，在国外不算是失业的，他是退出劳动市场。这在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很明显的，因为福利太好了嘛。这个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中国并不是福利因素，它是由于整个工资水平下降，工资太低。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很多把门的，这个工作只要是大学的子女他愿意做，肯定是优先照顾子女的，但是他不愿意做，就是工资水平太低，不够体面，工作条件比较差。这三个来源产生了失业问题。

现在我们主要谈城里人的失业问题，因为城里人的政治力量比较强，他的抗议更有发生的渠道。城里人的失业问题，一般人估计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在百分之十到十四甚至十五的这个水平上，我想恐怕要维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在欧洲国家，10%的失业水平，一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10%是一个坎。中国这个情况来看呢，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可能会维持在10%之上的失业水平。这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收入不公的问题也有类似之处，就是这个社会的某些阶层收入增长比较快。

最近政府有意识地给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阶层增加待遇。比如说知识分子，尤其是有选择的，北大、清华的教师的工资提高得很快；军队，他是工资提高得很快；中央部门的公务员，地方的不敢讲。（时殷弘：**各省比中央有的还好。**）那取决于各个省情况了，中央不能定，对吧？中央政府就是先把这些政治上有权力的、有影响力的人的工资提高得很快。这跟八十年代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八十年代是相反的，这部分人的工资降得很快，反而那些社会上、舆论上没有能力的人，比如出租车司机，工资升得比较快。今天的收入不公和八十年代的收入不公有一个本质区别。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收入不公上面的信息不对称。老孙不是讲这个信息不对称对政府统治不利吗？实际上，信息不对称有时候对统治有利，使得很多老百姓搞不清楚其他人的收入多少。今天，你去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北大、清华的教师的工资多少，他搞不清楚；你去问北大、清华的某一个系比如社科系，公共管理系的、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师工资多少，他也搞不清楚；甚至于你去问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自己，都搞不清楚。就连这个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甚至都搞不懂他底下教授有多少收入，因为他底下很多都是出去兼职，出去做项目，出去教课，是在工资之外的收入。这样就不会引起社会不满。他只能从消费水平上判断。比如出租车司机看你穿的衣服怎么样，你打两块钱的车还是一块六的车。现在的这个收入不公平或者是收入差距的增大，也就是财富的差别，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成熟的市场才会有财富的差别。你光看收入是看不出来的，光看穿什么衣服更看不出来，那教授的衣服说不定比出租车司机还差，还不讲究。抽烟也不讲究，看不出来；你得看财富，而财富现在呢，很大情况下又是隐性财富，不光是体现在住房和汽车，很多人的财富在银行里，甚至在**外国银行**，或者在股票市场里面。这一点，又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从这点来看，我觉得，现在收入不公带来的危害，可能比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收入不公要小得多。

（**裴敏欣：我问你一个问题：政府在这方面最近有哪些政策？你对这些政策的评价是如何？**）据我了解，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很有限的。中央政府只是对地方政府施加一些政治指标，说你这个地方的失业率不能超过多少，就是你报上来的失业率不能超过多少，你失业人口不能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就像当年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是一样的，是通过行政分解、行政手段来要地方政府的政策去解决。地方政府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比如说广州市，这个地方有很好的待遇，它是按工龄算，把工龄买断，对这些早退的工人是很好的安置方法。（**裴敏欣：那个是安置失业工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制造就业机会。**）

孙立平：我要补充两句。第一个，造成失业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问题。你看每年 7%、8% 的增长，这个增长率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多少？原来最高的时候可能达到 3%，然后到百分之二点几，1.7%，0.9%，0.7%，0.3%，降到百分之零点零几。就是说，每年现在 7%、8% 的经济增长，能够创造的机械就业机会已经微乎其微。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而且，从现在进一步地发展，特别是在信息革命之后，如果生物革命能够实现，将会是一个更大的冲击。我觉得，7%、8% 的增长带来的甚至是负的就业机会，这是非常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当中的大量的潜在的失业人口。在大陆，劳动人口占整个人口 70%，那么农村假如说是 9 亿人口的话，就是 6.5 亿左右，加上半劳力。按照九十年代末的技术水平，种这块地，包括林牧副渔都加上，两个亿的劳动力就足够了。然后呢，一个亿的乡镇企业，一个亿的农民工，那么还剩下 2.5 亿。农村当中有 2.5 亿剩余劳动力，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是说，最近在政策的层面上，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前一段开了全国就业工作会议，把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重视的因素。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刚才稻葵说的，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大可怀疑的。第二个，也是很难落实的，就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是特别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个是城市化。我觉得，现在很可能真正能够导致就业机会增加的，是所谓的一些新兴的制造业中心，它能够对劳动就业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在讨论“世界工厂”的问题，就是制造业。但是，这创造的这部分就业机会，其实也不是能够面对从农村当中转移过来的或者是国有企业下岗的，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大规模的现象，虽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把这个潜性的事件往后拖延，比如说大学的大扩张。）

根据我在长春作的调查——长春的失业率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解决自己生存的办法。每个人的那个办法都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确实是每个人都有。理论化一点来说的话，可能背后确实有一个非正式化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当中存在的大量的非正式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他也不用成立一个公司，就帮你对个缝，可能对缝他们也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挣了几百块钱；你想做这个生意，他想做那个生意，我在中间给你帮个忙什么的。都不列入正式的经济当中的。一般的说，两口子有一个下岗的，靠一个没下岗的；还有一个途径是靠父母，他假如三十多岁的话，父母可能是 55 岁，六十来岁的样子，可以支持他吃饭、住房，解决这两个东西。小孩十几岁了，他又觉得呢，过几年小孩又有指望了。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真正吃饭出现问题的并

不是很严重。严重的是三个问题：子女教育的费用；养老；医疗。

李稻葵：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被夸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用人单位它也是在资本和人之间进行选择的。（孙立平：这里可能说的是简单了，但是，7%、8%的增长的情况下，它创造的就业机会直线地下降，这是一个事实。可能也包括体制的因素，也包括技术的一些因素。）这涉及到新建的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就目前的金融体系来看，它最愿意贷款的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可以抵押，机器设备可以抵押。但是，你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抵押的。这也是我们金融、银行体系的一个巨大弊病带来的后果，一个恶果，使得那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很难得到贷款。（丁学良：在西方一些国家里，它会有政策上的一些优惠。）有税收的优惠呀，中国没有。关键是贷款，没有贷款什么都谈不上，谈不上优惠了，你根本不能建立企业呀。（裴敏欣：美国政府采购，大概28%左右的钱给中小企业，专门买中小企业的。）（孙立平：中国的思路是，为了迎接世贸挑战，企业就得越做大越好。）

城里人失业，虽然他短期内可以被父母养着，短期内他可以有“对缝”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稳定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是游手好闲，有富余时间，一旦社会上出现什么动荡，出现什么游行的事，他愿意参加，他有时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裴敏欣：就是说，经济手段来看，政府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孙立平：这么说吧，就这么一个条件，这么多的人口劳动力，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源是创业不够。不是就业不够，而是创业不够，根还是在那个金融体制。

（孙立平：我不同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是投资比较充分的话，也难以解决。如果说目前投资不充分的话，7%、8%的增长率哪来的？）这个东西啊，部分是属于政府发行债券，投资在大中项目里面。（孙立平：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投资的问题解决了，这么大的劳动力也是容纳不了的。）

孙立平：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在城市化当中新造成的失业人口。最近这几年一直

在搞城市建设占地，然后就把这部分农民“农转工”，同时解决他两个问题，一个是转成城市户口，第二个就是在城市当中给你一个就业机会。基本上给的都是大集体。（×××：你刚才讲城市化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措施，它不是增加了就业吗？）是啊。城市人口增加，它会新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比如说服务业、饭馆啊、公交啊等等，这肯定会增加一些。但是，这个增加不是一个线型的东西。最近有一个博士生作了一个调查，发现这些“农转工”的，现在基本处于失业状态。为什么？一个原因，原来给他们安排的都是大集体的，这些大集体的企业基本都倒闭了；第二个，他原来受的教育，高中是最好的，在劳动力市场完全没有优势；第三个，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它主要靠社会资本，就是原来你在这个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了，老同学啊等等。这些人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和社会资本，所以有些人又回去再承包地，种菜种粮。这些人既比较集中，同质性又比较强，真看不到任何出路。

李稻葵：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里面，百分之三到四的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就是经济增长很正常，经济运行很平稳的时候，应该是百分之三到四。因为这部分人总要换工作嘛，总是有人找工作，所以需要时间，需要休息一段，或者妇女生孩子。一般认为到10%就是警戒线了，就是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了，很多人社会不满了。这是一般的民主社会里面。中国这个情况不行，三到四做不到。而且，我们关心的是城里人的失业问题，农村他没有政治力量，他可以回家，家里面有土地。城里人的失业率呢，我想，超过百分之七到八，就会有问题。而目前的水平是百分之十二甚至十四，这个是持续超过警戒线的。

孙立平：我研究农民工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这个差别非常有意义。就是说，西方城市化的过程，是在一个农村社会已经分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人转移到城市，而一些没失去土地的人呢，他可能有一片比较大的土地，可能你让他到城里来他也不来。但是，中国农村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传统发展经济学把现在农村农民工的转移看成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结果，这是一个太笼统的说法。它首先假定，谁剩余，谁不剩余，是可以落实到人头上的，剩余的转移出来，没剩余的在农村当中工作。实际上，在中国的情况下，它有平均分地、社会不分化这个背景。每家都有那么一块地，一家几个劳动力。农民工不是对劳动力剩余这种状况的直接反映，而是对劳动力剩余造成的一个普遍贫困化的反映。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就是说，农村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流出者。他之所以没流出来，是其他结构因素，比如家庭结构啊，家里要不要留儿留女养老啊等等。

裴敏欣：我要提一个今后对中国很重要、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就是艾滋病问题。最近 CIA 做了一个研究，《外交事务》最近第一篇文章，都是讲这个，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国在今后 10 年到 15 年当中，是世界上艾滋病的重灾区。如果这个势头得不到控制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大大受挫。那还带来人们的痛苦，甚至对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体制，对防治艾滋病最力不从心，国家能力退化，又是专制体制。又有着文化上因素，许多习俗性的因素，使人家对防治艾滋病问题不太愿意谈，忌讳。

孙立平：我不是**艾滋病专家**，只是道听途说了一点。首先，可以肯定这是个问题，甚至将来可能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多少年、一直处于一个掩盖的状态。像河南的问题，实际上七八年前就已经很严重了。（裴敏欣：据说河南就有 100 万人带带病毒啊。全中国，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它是上限 400 万。官方数字是 100 万。而且，它的增长是几何数字啊。）第二个，最近有一个转机，就是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公开表示，可以接受西方的援助。这是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了，这个变化可能会带来信息的更透明一点。第三，按照我的直觉的一个判断，根据我能够看到的材料，包括民间的材料，吸毒、输血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裴敏欣：在中国，今后最大的一个传播渠道，倒是那个“性工作者”，妓女。这一条道不得了。现在世界上两个重灾区，非洲跟印度，都是这一条是主道。卖血主要传染边缘群体，就是卖血的穷人。但是只有妓女能够传入主流社会。）根据现在调查的资料来看，确实是卖血第一，吸毒第二，性传播的比例要小得多。河南这片主要是因为卖血，云南啊、贵州啊那些主要是吸毒了。究竟是情况确实就是这样，还是说通过性传播因为它更分散，不容易被发现，这个情况我没办法来判断。但是，假如说前一种情况是确实的话，那我们能够看到，主要是通过人和物的接触来发生的，而不是通过人和人的接触来发生的。这传播的途径，最可怕的是人和人的接触。那么，这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能找到一点乐观一点的理由。还有一种我没法判定的说法，说中国人这个人种因为生理、体质的因素不太容易发生艾滋病，通过性的方式来传播的几率相对比较小。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中国有两个奇迹。第一个，一个小孩从六七岁一直被折磨到二十多岁，非人道的这种教育啊，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折磨，有的从胎教、肚子里开始折磨，一直折磨到他研究生毕业，折磨这么长的时间，精神病



的发病率还这么低，这是一个奇迹。第二个就是这个艾滋病，这么差的一种情况下，包括能够触及艾滋病的因素这么多的这种情况下，还没到一个不可收拾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奇迹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可悲的原因，就是这个政府。像河南这边，河南卫生厅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组织人去卖血啊，都是通过正规渠道，这是政府犯罪。（**裴敏欣：至少是犯了一个不到位的罪。**）它就是致富，要帮助老百姓致富，就组织那个卖血。

裴敏欣：所以这里面就是很难乐观，真的很难乐观。艾滋病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危机，它需要的几个因素，中国都有。我们现在不要有什么种族观念、种族优越感。你看那个中国的政府，有缺位的，有政府腐败的，有官员个人腐败行为，有政府无能制止，有文化方面的，还有经济上的原因，都在里面。最近这方面材料我看得蛮多的，我推荐大家都要看联合国的一个专题报告，把中国说成是那个“泰坦尼克”，那么大的危险性。一般人认为，艾滋病都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其实得艾滋病的人是最有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因为他是性生活最活跃的。而且，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是最有钱来买性服务的。你看非洲那个情况就知道，死去的一批都是最有生产能力的那一批。而且，你如果说准备要用药物来维持的话，那个开支不得了！就是最最便宜的药物，一年是 600 美元，中国最便宜的就是“盗版”药，就是从印度进口的那些药。这个开支是不得了的经济负担。（**时殷弘：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一点，你说对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很大吗？不一定。大跃进死了多少人？**）不一样。（**吴国光：艾滋病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处境，觉得生存无望了，铤而走险，就是一股不要命的力量。**）（**丁学良：艾滋病者的一个抗议群体，这就更可怕了。警察都不敢碰他嘛。艾滋兵团，见到人就咬。**）出现这种犯罪群体的话，政府它根本就没有任何道义来用政策、合法对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怎么样他们，连卡斯特罗的古巴都不敢。但是艾滋病他这个潜伏期你看不出来的。而且，他越采取这种知道了就抓起来的办法，人家就越不去检查，那个艾滋病的扩散就越快。

孙立平：有一个调查，说那个小姐啊，她讲的非常有道理。调查的人问：“你怕不怕艾滋病啊？”她说，“不怕，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她说：“艾滋病从传染到发作，要 20 年左右”——这是她的一种说法啊——她说，“你

想啊，这 20 年的技术进步会有多大？到那时候就解决了。”

丁学良：同样的话，在其他国家也有的。我看到一个资料讲，在印度还是在哪个东南亚国家，人家问那个妓女，“你才十八九岁，怕不怕死？”她说，“我怕和不怕有什么区别呢？”她说，“我或者是几年以后得病死了，或者是现在就饿死了。”这就是她的理论：我生病死的话，还有几年时间，这笔钱还可以养活我家里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一般不会走这条路的，只有在贫困社会。

**裴敏欣：中国政府的确没有一个系统政策，看不出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孙立平：有一个因素啊，别人都很难相信的。加入世贸之前，我问温铁军：“中国的农业政策究竟是什么？”老温说，“我也关心这个问题。”他说，“我就一直往上问，一直往上问，就是加入 WTO 以后的农业政策究竟是什么。”他说，“你都不敢相信，没有。农村的政策只有一条，就是按照我们的感觉，‘别出大事’，就是这一条。”他就是一条，别在国际上造成他太坏的形象。艾滋病对投资环境有影响。（裴敏欣：绝对有影响。人家还会过来？甚至在西方社会，这个艾滋病也是谈虎色变的这么一个事情啊。即使在人家条件很好，制度优越性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人家还是花很大的力气来对付这件事情。）（李稻葵：我觉得，类似艾滋病这种性质的问题，在中国还有好多，可以找出很多来。比如说，医疗体系的问题。环境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准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我们这里没有太突出，就是刚才稻葵讲的，就是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我们是集中在失业等这样的问题上，将来社会保障问题会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因为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这个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已经是寅吃卯粮，将来，我觉得，按照现在的体制如果不变化的话。。。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你只要有钱，可以延续你的生命。但是，它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伦理上的问题。原来这个病治不了，医生也没责任，心里也很清楚，家属虽然悲痛，但是也比较轻松，治不了啊。第二个，经济上，一个人的病，就可能对全家来说意味着经济上的破产。假如说你有 10 万块钱，准备买房子的；假如你父母得了个病，说，“你只要一天有 500 块钱，我可以给你维持生命。“你说这事你怎么选择？是每天出 500 块钱，十天出 5000 块钱，一百天出 5 万块钱来维持他的生命？还是拿这钱买房子？如果拿这钱买房子，你觉得说不过去。这造成一个经济和伦理上的问题。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个问题过一段，会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严重。就是刚才说的信息革命之后的生物技术革命。再过几年，生物技术的革命，咱们这个年龄，你只要熬 20 年，就能熬 50 年。就是说，你再熬 20 年，现在这个导致致命的疾病，癌症等等，都可以解决，假如本来可以活到 80 岁，这就可以活到 120、110。你要能活那么长，得过若干代，得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遗传，你其他的方面才能够支撑啊。但我们没经过这个进化的过程。你年轻时候吃了那么多的农药，是吧？那么，就算你能活到 120，但你到 80 岁、90 岁的时候就已经老年痴呆了，然后这个社会当中就大量的处于痴呆状态的人。

裴敏欣：这可能是比艾滋病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

李稻葵：这个我可以讲一下。刚才讲的是医疗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它分好多块，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我们也没有发言权，因为没做过很多研究。但是，从目前中国来看呢，现在医疗保险体制肯定难以存续下去了。但是，这个问题呢从道义上讲和从现实的政策角度讲不太一样。比如说，中国跟美国比较一下。美国现在是医疗保险，它也是保 65 岁以上的老人，那么 65 岁以下的年轻人它完全靠商业保险来解决的。而这个商业保险呢，即使在美国这么发达的社会，大约有几千万人。（裴敏欣：三四千万。）三分之一没有养老保险的，它也过来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果要建立一个全国的高水平的医疗保险，从道义上来讲是好的，从现实来讲呢，又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一个简单的评价。

养老保险问题，我倒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我觉得，目前严重是因为这是社会问题。目前看，我们国家养老保险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中国就国际标准已经变成一个老龄化国家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体制已经进入危机了呢？我觉得，按现在的情形来讲，是这样的，但是，通过政策调整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传统上来讲，养老保险体制的覆盖率非常小，它就是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工人之中。目前来看，自从九十年代开始搞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这个模式，出现了两个养老保险体制。一个是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制，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体制基本上全是财政付钱的，所以目前谈不上危机的问题；国家财政不出问题，这一块就不出问题。现在问题最大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问题。问题在于抚养率非常低，现在是 2.9 比 1。换句话说，就是大致三个人养一个人。接近于美国了，美国差不多三个人养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下，负担非常重。但是，中国有一个好处，它覆盖面非常小。如果扩大覆盖面，

把比如说乡镇企业的职工包括进去，把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也包括到统一的养老保险体制里面去，把现在的进城的农民工包括进去，那么这个抚养率一下子就达到百分之九、百分之十几的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尽管整个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从这个方式来讲，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这个体制的可持续性我觉得是有的。

被现在这个体制所包括的人大概是只有几千万人，体制内的抚养率是 2.9 比 1；大多数的人是在这个体制之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难扩大。为什么很难扩大？就是现在这个整个企业的养老保险的费率非常高，大概光是养老保险一项，国家规定是 20%左右，但是平均来讲各省是 28%左右。就是光养老保险一项，你要缴费 28 左右。这对企业来讲——当然它是个人缴一部分，主要是企业负担了——负担太重了。如果按这样一个费率去扩大的话，将会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立马就上去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摔下来了。那么要想扩大这一块呢，采取的一个必须办法，就是降低整个的缴费率，把缴费率降到 10%、15%。这样的话，大家才有兴趣参加，我参加才值得。如果我缴了很多，退休的时候拿的很少，就不值了。降低缴费率，扩大覆盖率，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它历史遗留的责任。这个历史遗留责任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很多人，他是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现收现支体制下采取这种，不能要新体制去承担旧体制的负担。换句话说，“老人老办法”，政府要重新筹资来解决‘老人’的办法，这样新体制有一个很好的起点，让它持续下去。如果政府下了决心，不是不能解决问题。（**裴敏欣：但是，最近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迹象……**）对。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职工他看不到他的个人帐户是真正地落实他个人名上的，他看不到这笔钱。政府代他存起来的，实际上个人储蓄这个帐户按理说应该是存在这一块，退休以后再还给他的。现在一般职工认为这个钱不存在，实际上也是被挪用的，挪用非常厉害。社保单位很希望收这个钱，收这个钱又不好好用，又不好好收。所以今后会有一个危机。小危机是什么呢？在个别地方，不见得是全国性的，会有职工闹事，就是说我这个钱存起来为什么没有啊？发不出来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搞了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以后，按理说，目的在于要搞个人帐户，实行基金积累，积累的钱将来可以用来个人的养老保险。但是实际上我们采取的滚帐的管理办法，就是养老保险的钱全放在一起了。结果呢，它使政府没有承担过去退休工人的这个历史责任，那么过去退休工人的钱是从社会统筹这一部分出。但是这一部分出的钱不够，于是就挪用个人帐户。目前来看，整个国家每年来算基本上是亏损的。现在有的省说，我们省今年这个养老保险的盈余有几千万、几百万。这个盈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这

只是讲社会统筹这一块盈余多少钱，但是，它本来就应该在那儿，它是把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放到一起，盈余多少钱，这个钱远远不够个人帐户应该有的钱。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大概有 26 个省出现了亏空、亏损，就是说把个人帐户的钱已经全部拿来用了，还不够。（裴敏欣：这个问题很严重。）一个是将来工人要闹事。另外一个，下一届政府要负担。（裴敏欣：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一天半来讲的都一样，许多都是危机延后，推到下一届。）